

尹钧科 主编

北京历史丛书

康乾时期北京人的社会生活

富丽 著



北京出版社

编者的话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首都，古称“首善之区”，意为全国最好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首都北京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正向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高度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首都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要求相比，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明确的决议。也就是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号召。作为我国首都的北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理应成为全国各地的表率，成为真正的“首善之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宣传和普

及我国悠久的历史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都北京，既是一座千年古都，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在这里的积淀，是极其深厚的丰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她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缩影。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她又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对于北京市居民来说，应当更多一些地知道北京的历史；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也应当更详细一些地了解首都北京的历史。知我首都，才能热爱首都；爱我首都，才能更好地建设首都。因此，向广大北京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宣传和普及首都北京的历史知识，是加强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从事北京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力量编著了一套《北京历史丛书》，共20本。既有从远古到现代的纵向历史选题，又有从经济到文化的横向历史选题，纵横结合，基本上反映出首都北京的历史概貌，突出了首都北京的历史特点。作者大都是本所的科研骨干，也邀请几位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协作。执行主编是尹钧科研究员。

《北京历史丛书》的编著，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也得到本院领导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和本院高起祥院长，百忙中为这套丛书撰写了序文。北京出版社承担了出版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我们谨以《北京历史丛书》作为菲薄的礼物，献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并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这套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999 年 3 月 10 日

序

侯仁之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都会城市。她不仅拥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而且拥有八百余年的建都历史，今天依然是 12 亿人口大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其兴起、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变，因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进程。这应该是北京举世瞩目的重要原因。

研讨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历程，追溯发生在这里的政治风云，回顾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介绍城市悠久的传统文化，不仅是认识首都发展历史的需要，而且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经济大潮中关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民族文化血脉

的延续，传统文化珍品的传承，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辉煌未来的重要保证。而这需要千百万人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

《北京历史丛书》的撰著出版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适应了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

爱我首都，爱我北京，首先需要了解北京，认识北京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厚的传统文化，激发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建设北京的热忱。而《北京历史丛书》从 20 个专题叙述提供给广大读者的恰恰是北京辉煌的历程和演进的轨迹。通过这 20 本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富有启发和感染力的著述的阅读，广大读者一定会有所收获、深受教益。为此，乐于将此丛书推荐给广大热爱北京并愿为北京在新世纪的发展贡献力量的读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也是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的最后一年。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和阅读北京过去的历史，总结有益的经验，为开创和建设北京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吧！

1999 年 4 月 8 日

序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高起祥

1998年夏，在市委、市政府理论中心组的一次学习会上，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说，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应该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规划未来。可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搞的10卷本《北京通史》330万字，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能不能请专家提纲挈领地讲一次，或搞个简本。请《北京通史》主编、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曹子西同志为市领导讲北京史已经安排（讲稿发表在1999年3月3日《北京日报》，题为《学点北京史》）；这次编写的这套《北京历史丛书》也是响应贾庆林同志的号召，通过20个选题将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加以浓缩，突出了北京史中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北京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都是广大

青少年，特别是在北京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应该甚至是必须了解的。

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一番话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北京史的强大动力，通过学习加强我们领导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始终以促进首都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为己任，历史学科在奋发图强完成了 10 卷本《北京通史》后，正在深入研究专史，已出版的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农业发展史》、《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北京《满学研究》（1—4 卷）、《北京湖广志稿》，正在进行的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对外关系史》、《北京通史多媒体综览》等。我们将尽心竭力通过历史研究为北京的现实和今后发展服务。

1999 年 5 月 5 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北京人的政治生活	(5)
1. 北京内外城居民的政治生涯	(5)
2. 北京城卫治安及行政管理	(11)
3. 对北京宗教事务的管理	(16)
(1) 对萨满教的管理	(16)
(2) 对道教的政策与管理	(17)
(3) 对佛教的政策与管理	(18)
(4) 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与管理	(22)
(5) 对天主教、东正教的政策与管理	(25)
4. 各民族上层人物的年班盛会	(28)
5. 俄使英使来北京	(32)
(1) 俄使来北京	(32)
(2) 英使来北京	(38)
二、北京人的经济生活	(42)
1. 北京旗人的生计	(42)
2. 北京人的农业生活	(49)
3. 北京人的商业生活	(55)
三、北京人的文化生活	(63)

1. 冰嬉与赏雪	(63)
2. 应试举子	(67)
3. 北京人观赏戏曲	(70)
4. 北京青少年的学习生活	(75)
5. 北京人的服饰	(79)
6. 北京人的居住	(97)
7. 北京人的饮食文化	(109)
8. 北京人的婚嫁文化	(115)
9. 北京人的丧葬习俗	(120)
10. 北京人的宗教和祭祀习俗	(126)
11. 北京人的岁时节令习俗	(134)
参考书目	(143)

引 言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王朝。若从努尔哈赤 1616 年建立后金政权算起，到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清朝共经历了 295 年。若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清太宗皇太极 1635 年改国号为“大清”算起，清王朝经历了 276 年。如果从多尔袞等拥戴少年的顺治皇帝在 1644 年进关入据北京算起，清代经历了 267 年。纵观有清一代历史，又可以以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为分界线，分为清前期和清后期两个时期。

清朝前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616 年（后金天命元年）至 1661 年（清顺治十八年），为清朝兴起阶段。1662 年（康熙元年）至 1795 年（乾隆六十年），为清朝的鼎盛阶段。从 1796 年（嘉庆元年）至 1839 年（道光十九年），为清朝由盛转衰阶段。1840 年以后是清政府日渐屈从帝国主义的衰落阶段。

清圣祖康熙皇帝年仅 16 岁，就在孝庄太皇太后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智擒权臣鳌拜等人，从此开始了康熙皇帝玄烨亲御天下的新时期。康熙在位期间，平定了三藩之乱，下令永行禁止圈地，并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开创了清朝政治上统一、稳定，经济上恢复、发展的鼎盛时期。在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曾命令清军两次击败沙俄军队的侵略，逼使沙俄政府不得不坐到谈判桌旁，和清政府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在国内，康熙还三次亲征我国西北噶尔丹叛乱势力，取得胜利。后来，他又命令清军平定了桑结为首的西藏叛乱势力，基本上平定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通过这一系列反对外国势力的武装入侵和平定国内边疆叛乱势力的战争，维护了大清神圣国土的完整和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继位以后，峻法明察，严惩贪墨，对康熙朝后期的弊政，大力整饬，实行了一系列行之久远的政策，为乾隆朝的兴旺发达和清朝长远统治创造了条件。雍正皇帝在他统治的十三年中，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他施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赋税制度，清查隐田，使士民一体当差。他还严行保甲制度，创立军机处，实行密折制度和养廉银制度，注意旗民生计。对内坚决镇压青海厄鲁特和西藏噶伦的叛乱，坚持对新疆准噶尔用兵，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外，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在位 60 年，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两定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次受廓尔喀之降，人称“十全武功”老人。乾隆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处于康乾盛世的全面鼎盛时期。

通观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他们和清朝开国时期的几位皇帝一样，实行皇室与蒙古王公联姻的政策。同时，又崇信喇嘛教，做为联络蒙、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对外，康熙警惕西方传教士的侵略活动，不准教会干涉中国的内政。雍正皇帝还将传教士驱逐到澳门。康熙在与西洋传教

士的接触中，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康熙末年，曾禁商民前往南洋贸易。雍正皇帝在中期则在广东、福建等地开洋禁。

总之，在对于农民、农业生产，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国家主要政策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一脉相承的。康熙朝初步奠定了统一强盛的中国的基础。雍正朝兼有巩固和开拓之功。至乾隆朝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所以，人们把清朝的康、雍、乾三朝称做“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同时，也和当时清统治者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执行合乎民意的政策分不开的。

“康乾盛世”的134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已和明代末年全国最大耕地面积接近并有所超过。从人口来看，顺治末年全国人口不过两千来万，而到乾隆末年则达到三亿。从国家赋税收入来看，顺治末年，国家岁征银2150余万两，粮食640多万石；而到乾隆末年，岁征银达到2990余万两，粮食达到830多万石。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在“康乾盛世”，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必定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康、雍时期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乾隆时期，则组织人编辑了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部巨著《四库全书》。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就已显露出其逐渐转向衰亡的端倪。文学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可以说是这种日中留阴影、鼎盛现衰微的真实记录。在康乾盛世还涌现出一批天文学家、算学家和地理学家。

康雍乾时期的北京，在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当时的北京，既是维系中国各兄弟民族的政治中心，又是清朝统治者控制中国人民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对外交往的圣地。本书的宗旨就是简明扼要地向人们展示康雍乾时期北京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当人们在回顾和欣赏这一幅生动、优美的画卷时，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执政者的成败得失，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更可以对清朝鼎盛时期北京人的社会生活和北京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层更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一、北京人的政治生活

1. 北京内外城居民的政治生涯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由盛京（沈阳）迁都北京后，便开始在京郊圈占土地，在城内圈占房屋。清政权为了安排八旗人丁的住处，强行命令原在北京内城居住的居民迁至北京外城。尽管清政府对被迁居民实行了蠲免租税的政策，但是，这些人因颠沛流离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面对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烈，争端日起的局面，清政府终于在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十九日（10月5日）颁布“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的谕令。于是，原在内城居住的汉人等居民，除了投充到八旗的汉人、寺庙中居住的僧道，以及居住在衙门负责看守仓库的书办吏役外，一律迁到北京的南城（即外城）居住。这一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对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康乾时期，北京内城居住的已经都是旗人了。旗人，从在编组织上来看，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每八旗又分为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正红旗、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镶红旗。其中，正黄旗、镶黄旗居德胜门、安定门

内，正白旗、镶白旗居东直门、朝阳门内，正蓝旗、镶蓝旗居崇文门、宣武门内，正红旗、镶红旗居西直门、阜成门内。若从血缘关系，或者说从政治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宗室贵族、异姓贵族和中下层旗人。

宗室贵族包括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失传下来的本支宗室，和其伯、叔、兄、弟旁支传下来的系列又称觉罗。宗室贵族，虽然没有单独的社区集中居住，而是分别居住在本旗居住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有专门的户籍等管理机构和制度，有专门的司法系统。特殊的政治地位又带给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和优先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他们是全社会生活在最上层的人。清朝宗室贵族不断繁衍扩大，和清廷对宗室实行封爵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皇子分府以后，并无郡国领地，只是在北京另赐宅邸而居。例如现在的雍和宫，原是康熙第四子胤禛的住宅。该府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明代太监官房旧址改建而成的。因为当时胤禛的爵号是多罗贝勒，故该府称为禛贝勒府。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爵号升为和硕雍亲王，该府改称雍亲王府。雍正当政以后，于雍正三年（1725年）将该府改为他的行宫，赐名雍和宫。清朝分封宗室贵族的爵位共有14等，从高到低依次为：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宗室人员可以通过功封、恩封、袭封和考封等四种途径取得这些爵位。清初，开国的“军功勋旧诸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和硕承泽亲王硕

塞、克勤郡王岳托，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等8人，被称做“八大铁帽子王”。他们有用兵权、议政权和旗主权，而且“世袭罔替”，其后代总有一嫡子原爵袭封。如果因故不能袭封，还准其旁支子孙袭封原爵。康熙前期，军功勋旧诸王的势力，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已经削弱；皇权日益加强。雍正皇帝曾因其弟允祥“公忠体国”，封他为和硕怡亲王，世袭罔替。皇室近支因祖恩而得封爵称为“恩封”。清制规定，凡皇子年满15岁，则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如果奉旨“暂停封授”，则隔五年再行奏请。于是，皇子照例均可获得封爵。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每代都有一嫡子可承袭规定的爵位，这叫做“袭封”。“世袭罔替”的功封人士的后代，每代都有一嫡子袭封原爵位。而恩封者的后代，每代有一嫡子递降一级承袭爵位。而降到一定爵位后则不再降，并以此爵位世袭罔替。例如，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则不再降。这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才规范了的。在这以前仍有不规范的袭封现象存在。“考封”，是指亲王以下各王公除有一子袭封外，其余各子年满20岁时，例应推封。但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才授以一定爵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规定，对亲王和郡王各子的封爵都减一级。例如，原来亲王嫡子以外的各子皆可封为郡王，今改为贝勒；郡王的嫡子以外的各子可封为贝勒，今改为贝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规定，应封爵者，在20岁要经过国语（满语）和马、步射的考试，优者可按例封爵；平者，降一级封爵；劣者，降两级。雍正、乾隆年间，又进一步完善了“考封”制度。例如雍正八年（1730年），制定了“王公以下嫡子考授例”。该例规定：亲王嫡福